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蘇聯介入與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不同史觀的討論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Uyghur Nationalism: On the Ways to Frame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doi:10.6752/JCS.201512_(21).0005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侍建宇(Chien-Yu Shih)

頁數/Page：127-16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Uyghur Nationalism: On the Ways
to Frame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Chien-Yu Shih

**蘇聯介入與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不同史觀的討論**

侍建宇

感謝朱元鴻教授於撰稿初期給予的撰寫建議與指導，以及後來兩位匿名
審查者給予的修訂意見，減低文中錯誤，補充原來論點不足之處。
侍建宇，香港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 / 英國倫
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 / 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博士生
電子信箱：shihchienyu@hotmail.com

airiti

摘要

對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出現原因，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國民黨政權堅持蘇聯外力介入，使得「伊犁政權」得以建立。共產黨政權則強調「三區革命」是民族革命，以對抗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壓迫。這篇文章認為現有的歷史詮釋，主要糾纏在「蘇聯外力介入」與「維吾爾民族主義」兩個因素的因果關係上；兩個因素各自獨立，或是互相依存，有著先後牽引的關係，於是可以推演出四種變異排列的可能。透過分析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的歷史論述，以及近年相關歷史學術研究提出的相關論證，這篇文章企圖體現政治力介入使得東突國研究變得扭曲，一方面展現國、共兩黨的論述口徑有著刻意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檢討相關研究文獻所提出的不同歷史詮釋。

關鍵詞：新疆、蘇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東突國）、維吾爾民族主義、雙泛主義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ists insist on a reading of history whereby Soviet intervention constituted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the 'Ili regime';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Communist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hree Districts Revolution' as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which aimed at overthrowing the oppressive rule exercis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wo factors, namely the Soviet intervention and Uyghur nationalism, and their four possible causal permutations, both contribute to plausibl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 of the rise of the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The article contain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bellion in Xinjia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fficial narratives embrac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respectively. With the aim of exposing the political intentions in framing a history they favour, the article plans to reveal the approaches of the two authorities in manipulating with selective materials and how historians have challenged and what needs to be articulated on this historical topic.

Keywords: Xinjiang, Soviet Union, East Turkistan Republic, Uyghur nationalism, Dual Pan-ism (Pan-Turkism and Pan-Islamism)

一、前言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4-1949，以下簡稱「東突國」、第二次東突國、或伊犁政權，以有別於1933年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或第一次東突國）¹研究主要糾結在兩個因素的依存關係；這兩個因素就是蘇聯外力介入，以及維吾爾民族主義。於是，就有四種變異的可能：

變異一、兩個因素各自獨立，沒有直接相關。

變異二、前者帶動後者；蘇聯介入肇致維吾爾民族主義得以勃興，建立東突國，覬覦吞併新疆領土或其他利益。

變異三、後者帶動前者；維吾爾民族主義反抗軍閥與民國統治，蘇聯隨後予以鼎助。

變異四、兩者同時並起，互相糾結影響。

當然這四種變異在論理上可以純粹地自行成爲選項，但是不能排除它們的確在政治實務上有著各自引申的意涵。時間雖然過去，由破碎史實拼湊出來不同歷史論述卻會爲不同政治勢力所支撐，算計如何利用不同變異選項去合理正當化自己的政權與政策。

這篇文章描述四種變異，並且勾串與檢討中國官方文獻與學術專

1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維吾爾語稱作 ئىتتىپاقىيىرىۋىھۇمۇچ ئاتىسى كىرۋىتى قىرەش،直譯英語就是East Turkistan Republic，但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漢語通常稱作「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或是「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這樣的稱謂其實與當時流傳的奧斯曼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有關，把「土耳其」當作一種想像的民族概念相關。近代史上維吾爾菁英對於「自稱」的演繹，捷克學者Ondřej Klimeš(2015)奠基於博士論文Awakened Land: Uyghur Ideas of Nation and Nationalism, 1884-1949 (2012)，有著非常細膩的討論；至於「東突」與「維吾爾民族主義」的關係其實也需要更細緻的分辨與闡述，這涉及當時蘇聯作爲他者，對中亞突厥族裔進行的民族識別、中亞與新疆維吾爾民族菁英的自視、以及他們對未來的國族建構的期許。當然後來在中國大陸官學界，放棄「土耳其斯坦」，改採「突厥斯坦」，辯稱是回歸歷史的「突厥」概念。但是這樣以古適今的稱謂也並非沒有爭議，字面上的更迭都有玩弄歧意之嫌。本文只是依循現在較通用的名稱，並沒有任何政治意涵。

著，以對照兩岸對峙的國民黨、共產黨政權的歷史詮釋態度。關於東突國的研究方興未艾，這篇文章將會討論中國政府所發表的三份關於新疆的白皮書，以及其他討論東突國的相關研究文獻，特別是楊邊琳(Linda Benson 1990)、王大剛(David Wang 1999)與王柯(2013)的三本專論，以辨明他們不同的論點。王大剛與楊邊琳的論點互相抵觸，分別展現本文分類下，變異二與三的兩個典型，呼應國民政府已經固定的東突國史觀。奠基在日文專著的基礎上(王柯 1995)，王柯專著則是最近增補並翻譯成中文。而王柯數條變異論點齊發的書寫方式，恰好可以用來對照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大陸，因為治理新疆政策與意識形態需要，總是在不同變異下猶疑的歷史話語。

中國大陸與前蘇聯所藏的當時歷史檔案，由於取得不易，本文並未援引作為推論的依據。至於，曾經參與過東突國的政治菁英，由於政治立場的選擇，他們撰寫的回憶錄與相關資料，運用上需要更仔細分辨其撰寫的時空背景與目的。²另外，關於當代維吾爾知識分子，以及海外維吾爾離散社群菁英對東突國的歷史論述，這裡礙於篇幅都不會深入討論，或作為引證的資料。

二、兩岸政權對東突國的論述評析

兩岸對東突國的評價原本不同。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根本上是史達林主政下的傀儡，而共產黨政府的官方論述則宣稱這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並因為發生地點在新疆北部的伊寧、塔城、阿爾泰三個地區，所以稱作「三區革命」。但是，近年國府與中共看法似乎開始趨近。

2 關於蘇聯時期，以及東突國相關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初步研究可參考(Ablet Kamalov 2010: 257-278)。當時曾任東突國總統艾力汗吐烈，在被送回蘇聯後，撰寫關於東突國功敗垂成的回憶錄(Alihan Töre Şaguni 2003/2006)。他的兒子Kutlukhan Shakirov後移居土耳其，在2003年首先將該書於烏茲別可斯坦印行，並於2006年翻譯成土耳其語在德國出版。

臺灣官方在1970年代以後就沒有過什麼變動，³基本上的論調就是：第一、不承認東突國。蘇聯當時亟欲併吞新疆，稱呼東突國為「伊寧事變」或「新疆匪亂」，就是蘇聯扶植新疆境內民族勢力的一次叛亂。第二、中蘇外交解決。當時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用盡全力與蘇聯進行外交周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於以放棄外蒙古、任其獨立作為條件，交換蘇聯不再干涉中國對東三省與新疆的主權。⁴第三、用人不當以致功敗垂成。透過與當時的「伊犁政權」進行交涉，最後共組「新疆省民主聯合政府」（以下簡稱「聯合政府」）。可是，當時代表國府的張治中，不僅無法堅持立場，在談判一直退讓，後來甚至更變節投共。第四、堅持中華民族觀。就算國府撤守臺灣，面對曾經參與聯合政府，後來流亡土耳其的伊敏、艾沙，也展開文字論戰，以「中華民族」批駁他們的泛突厥主義說法。⁵

因此，換句話說，國府官方對於東突國的論述，基本上認定這是「變異二」，而這樣的說法當然不能排除是為國府卸責，盡力彰顯出蘇聯外力干涉操弄的影響，而導致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的勃興，政治上肇建東突國。

至於，中共主政的大陸官方，在早期，將東突國定位成「三區革命」，強調這是「民族革命力量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間的殊死鬥爭」。可以看得出來，在1950年代，中共對蘇聯「一面倒」的策略，所以並不願提及蘇聯介入新疆事務的情況，立場謹守「變異一」，只是緊咬

3 這樣的立場廣見於臺灣官方與民間的出版品，其中蒐羅檔案最豐的就是：（張大軍 1980），共12冊。另外，當時曾經目睹或參與人士的回憶錄也基本都抱持同樣的立場，像是堯樂博士回憶錄、廣祿回憶錄。盛世才也曾經與他人合作，或自己與親人都撰寫過回憶錄，參見(Whiting and Sheng 1958)與（盛世驥 2000）。

4 秦孝儀編，1981，〈三、新疆交涉〉，〈五、雅爾達密約有關交涉及中蘇協定成立經過〉收錄於《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頁435-463、539-652；尤其在618-619頁，宋子文曾提及蘇聯應該停止軍援伊寧，但是史達林矢口否認。

5 朱家驊在〈論所謂新疆問題：致穆罕默德伊敏先生一封公開信〉；〈再論所謂新疆問題：覆穆罕默德伊敏先生函〉兩文中，回應伊敏與艾沙的論點，參見（朱家驊 1970：84-94、95-112）。

國府治疆的失策，引起當地民族的反抗。中共建政後強調推動「民族區域自治」，消弭民族問題，最多也只是警告東突「反動分子」不要輕舉妄動，絕少公開討論蘇聯在東突國的角色。⁶

但是，這樣的論述在1990年代開始鬆動；中國官方與民間學界一方面雖然仍舊使用「三區革命」的字眼，但是也開始批評伊犁政權的民族主義者，說他們犯下「分離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更描述蘇聯在事件中扮演積極介入的角色。⁷這樣的發展與改變當然與新公開史料與檔案運用有關，同時也與中共管治新疆的意識形態與策略更迭有關。

中國官方正式論述近來似乎刻意地模糊，總在「變異二、三、四」之間游移徘徊。中國近年在三個正式發表的文件中，曾經直接提及並論斷東突國的歷史地位，分別是國務院新聞辦發文的《「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⁸《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以及《新疆的發展與進步》三份「白皮書」（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2，2003，2009），藉此可以顯現中國官方面對如何定位東突國的遲疑。

6 中共官方文獻一直盡量迴避討東突國所參雜的蘇聯因素，頂多有一些隱晦的暗示。例如，在1957年周恩來發表〈關於我國民族政策幾個問題〉的談話時，一方面形容「新疆也有過反對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同時也評論「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動分子進行東土耳其斯坦之類的分裂活動，就是被帝國主義利用」。一直到1962年中蘇邊境發生少數民族外逃情形，中共官方仍然只形容是「在外來煽惑下」，並沒有直指蘇聯的介入。周恩來談話記錄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編 2010：190、214〉。

7 中國大陸評論東突國的出版品，在1990年代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仍然抱持「三區革命」作為中國革命一部分的史觀，例如（白振聲、鯉淵信一 1992）；以及（陳慧生、陳超 1999）。不過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出版品也開始出現轉變的跡象，描述蘇聯的介入，而最廣為徵引的作品就是（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撰 1998）。至於第三、直接論述蘇聯在二戰時期與戰後介入新疆的著作，就是（沈志華 1999：213-242），以及（薛銜天 2003）。

8 2009年10月，無論是中文版（人民出版社），還是英文翻譯版 *East Turkistan Terrorist Forces Cannot Get Away With Impunity*（外文出版社），兩本冊子的作者均掛名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將2002年這個官方正式對外發表的檔與其他兩個新疆白皮書收錄於一起，意涵這個文件也有「白皮書」效力。

首先，三份文件都一致清楚地指出：「從二十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末，『東突』勢力在外國敵對勢力的慫恿、支持下，多次製造動亂」。不同的是，第一份文件只提及「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也就是短命的第一次東突國，刻意避開所謂1944年「三區革命」的第二次東突國；等於只是肯定在外力干預下，「列舉」曾經存在過一次東突分裂經驗，對伊犁政權則存而不論。

第二份文件則補入「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一部分的『三區革命』」，但是強調事件是為「反對國民黨統治」，並歸咎於「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蘇聯烏茲別克人）竊取了『三區革命』初期的領導權，在伊寧成立了所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自任『主席』」，但是同時也點名肯定「『三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理由是他們「撤消艾力汗吐烈的職務，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改組為伊犁專區參議會，分裂勢力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換句話說，第二份文件轉變成「部分地」指責三區革命／第二次東突國，有一些分裂主義分子存在並攬權，但是仍有人抱持不同的主張。

第三份文件更闡述「二十世紀初，部分狂熱的新疆分裂分子與宗教極端勢力，將『東突』一詞進一步政治化，編造了一套『東突厥斯坦獨立』的『思想理論體系』」，似乎承認「東突」是一種政治認同，能夠作為動員的民族主義意識與運動。

假設三份文件有著一致性，綜合起來，中國官方這樣的論述立場其實在因果關係上很混淆，對於第二次東突國的定位避重就輕，只確定「外力干預」，可是並未點名「外力」是誰或什麼。就算可以把外力等同於蘇聯干預，那麼仍舊結合著「變異二、三、四」各種可能性，因果不清。

對於中國官方論述內容更細緻的描述，則可以參照由政府智囊，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前主任厲聲領銜的出版品《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厲聲的論證邏輯主線是：東突分裂主義就是「雙泛」（意指「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蘇聯錯把「雙

泛」當成「民族解放運動」，而三區革命實際上是「新疆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國內政治鬥爭」。可是，蘇聯卻錯幫受「雙泛」影響的、以艾力汗吐烈為首的「封建宗教上層人士」（厲聲等 2003：137-187）。⁹厲聲該書的重點就是要區分三區革命中的「雙泛分裂派」與其他少數民族的「民主革命派」，強調出後者並未執意要分裂中國，可以統一戰線。

這樣的論點其實非常牽強，也顯而易見。第一、「東突」作為一個民族動員意識，是否可以等同於「雙泛」，其實很有爭議。泛突厥主義的想法與泛伊斯蘭主義並不見得相容，在政治動員上，當然也有可能結合。¹⁰第二、蘇聯除了協助東突國，也曾經大力支持盛世才這個「軍閥與漢族殖民政權」，難道當時就不需要「民族解放」，所以應該不是錯幫「雙泛分裂派」這麼簡單。第三、艾力汗吐烈、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都在東突國政府擔當要職，在沒有論證他們的權力位置，政治認同、以及與蘇聯的扈從關係之前，怎麼推論出誰是分裂主義者，誰又是維持中國主權統一者？

綜合上述討論，中共官方似乎只是不願意昨非今是地推翻正統「三區革命」論述，把立場由「變異一」直接調轉到「變異二」。所以透過帶入「外力干預」的因素，並論述「雙泛」起源、在新疆散布的時序，以便拉扯出「變異四」的可能。又經由「反抗國府對新疆人民壓迫」，提升「變異三」的可能性，拉入對東突國興起的論述。但是仔細考察，這樣混淆的話語策略其實並不能抹滅中國官方趨近「變

9 對於兩次東突國的興衰與外力干預情形的討論，參見厲聲該書的第四章〈「東突厥斯坦」分裂主義的由來與發展〉，第五章〈三區革命運動與新疆和平解放〉。

10 米華健(Millward 2007: 224-230)認為蘇聯涉入第二個東突國頗深，但是透過「雙泛主義」評價整個政治運動是完全沒有史實根據的。在行動初期的確有伊斯蘭宗教人士涉入行動、進行動員、擔任領袖，甚至與世俗派領袖分庭抗禮，但是這並不代表整個運動依循「泛伊斯蘭主義」主張進行。再者，那些世俗領袖也不曾依循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泛突厥主義，鼓吹在中亞建立「大突厥國」，所以那又何來「泛突厥主義」的指控。反而那些與國民黨政府結盟的維吾爾菁英，他們在聯合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伊敏、艾沙、麥斯伍德，反而相對更有「雙泛」的傾向。

異二」的詮釋。¹¹因為一旦確認蘇聯實質介入的史實，主導伊犁政權建立，就等於將東突國史觀從「變異一」調轉成「變異二」。在不願意直接做出這樣的變動下，勉強同時兼顧兩種變異、或至少不全盤否認「三區革命」，強調伊犁事變在維護中國統一的「政治正確」，那麼分裂責任就要轉嫁到各個可能的外力干預、以及一部分伊寧領導人的身上。這樣的論述口徑並不能釐清導致伊犁事變各種因素的先後重要性，畢竟並不是所有因素在所有的時空背景都同等重要，「雙泛分裂派」當然也沒有實力能夠否決蘇聯執意介入；可是蘇聯卻有能力鼓動操弄維吾爾民族主義。

當然作為中國官方正式論述不可能排除在實務上考量對現行民族政策的影響。因為一旦完全否定「三區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或可給人藉機簡化並挺立當時東突國作為一個民族主義運動，並藉古喻今地，反證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東突國具有某種的政治正當性。進而作為當前維吾爾民族主義，或東突復國運動「政治正確」的發動基礎。¹²

中國這三份正式描述新疆治理現況的官方文件，原本的目的並非針對東突國歷史進行闡述，而是要直接因應911恐怖攻擊事件對國際形勢帶來的改變。美國進行反恐戰爭，並重新評估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激進伊斯蘭運動發展態勢。中國擔心美國的反恐政策會波及鄰近接壤的中國新疆，所以想要立即闡述清楚中國對新疆的正式態度。同時，中國也企圖利用全球反恐戰爭，在論述策略上，將1990年代以降發生在新疆當地的暴力紛擾活動定義成恐怖主義；這在第一份文件《「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表現得非常明顯。

11 也有意見認為隨著中國以國家主權與愛國主義替換原有的共產主義革命價值觀，當代新疆史的研究者也開始傾向與將東突國歸罪於蘇聯的介入，透過維吾爾民族主義，分裂中國。參見（吳啓訥 2010：156-162）。

12 這種把歷史當成執政或治理策略的論調，常見於中國大陸境內的學術討論過程中。舉例來說，可參見最近中國人民網對於一個討論民國時期新疆的研討會內容，其中描述討論「三區革命」的部分，不同中國學者對這個事件的修辭話語（曹新玲 2013）。

僅僅相隔一年時間，中國隨即出版第二份文件《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目的就是補充前一份文件《「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背景資訊，拉出歷史縱深。第二份文件就是在辯解第一份文件關於新疆恐怖活動的指控，詳細說明為什麼中國官方認為新疆當地暴力騷亂是恐怖攻擊。由於這兩份文件洋洋灑灑地對新疆歷史有著非常詳盡的官方立場描述與闡釋，¹³也因此可以用作本文分析的文本。

第三份文件是在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騷亂事件後出版的《新疆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原本的初衷是對西部大開發政策作一個官方的總結。這份白皮書進行資料蒐集、撰稿起草的開始時間，其實早在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爆發前就著手進行，並非急就章地為回應這個事件。¹⁴從整本白皮書行文理路來看，目的是希望將二十世紀初期、末期、以及近年發生在新疆的暴力騷亂進行直接勾連，論定這些行動都是一脈相傳，作為中國官方的論述。但是這樣透過歷史辯證現實的企圖其實破綻百出。官方論述如果再聯繫上「雙泛主義」，甚至為求與國際反恐戰爭接軌，將「雙泛」再加上恐怖主義成為「三股勢力」，其實在論理上明顯有著前後不一致的形況。而且可能愈描愈黑，根本就是一種歷史類比(historical analogy)，需要不斷地調校官方版本的歷史描述話語，以求自圓其說。

13 這兩份官方文件在歷史闡述上的人為斧鑿清晰，所以論點也很容易遭到挑戰。所以，一旦出現不同的聲音，中國官方與相關學者也很難以容忍，並或者需要對論述進一步再修飾圓場。當時因應反恐戰，美國需要對阿富汗周邊地區進行了解，美國學界受政府委託，研究並出版一份初步對新疆研究的報告書：初稿以研究報告形式，可以從網路下載(Fuller and Starr. 2003,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docs/publications/OLD/xinjiang_final.pdf)；最後定稿，也另外集結正式出版(Starr 2004)。這份研究報告由於對歷史闡述的角度與中國官方不同，遭到抵制；所有參與該份研究計畫的研究者之後都被禁止進入中國與新疆進行田野調研。這樣的作法儘管在研究新疆的國際學圈造成震撼，但是也無可奈何。(相關報導資料可見Golden and Staley Aug 11, 2011)。同時，另一方面因應相關研究出版品逐漸增加，無論是由中國大陸出境在外求學的王大剛，或是在日本由王柯與新免康(1994)早就出版的專論，還有中國大陸沈志華(2013)的研究，他們引用全球各地蒐集來的檔案材料，提出對東突國歷史不同的詮釋，都與官方口徑有明顯差異，也迫使中國需要提出進一步的講法論述。

14 關於白皮書發表的緣由，均為參與白皮書起草的學者親自告知筆者。

三、楊邊琳的「變異三」VS.王大剛的「變異二」

相對於官方立場的扭捏遮掩，學術研究的論點就非常直接。楊邊琳強調伊犁事變源自國府治疆失誤，而王大剛認為東突國根本就是蘇聯的傀儡政權。他們的論點可以就五個方面來討論。

（一）伊犁事變源自國民黨民族政策失焦？

楊邊琳認為兩個主要原因造成新疆當地民族的叛變，第一就是盛世才的高壓統治，第二則是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統一中國的策略：她認為癥結在於國府不願意直接面對民族問題。當時正值抗戰末期，一則無力調兵新疆進行軍事解決，再則國府執意東突國是蘇聯挑撥與干預所形成的附庸，所以認為東突國問題可以透過「國際政治」手段處理；也就是可以經過國際列強權力平衡，或中蘇外交折衝來解決。

楊邊琳強調這是國府對當時新疆民族意識發展狀況的不理解，這種不理解更糾結蔣介石的「中華民族一宗族觀」。當時國府並不承認中國邊疆有民族問題，辯稱「中華民族」是由許多「宗族」共同組合而成，更認為融合這些宗族的方式就是「同化」或「扶持」，¹⁵而具體方式就是政治教育與移民新疆，楊邊琳在書中第二章〈民國時期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多所著墨(Benson 1990: 10-18)。

在第四章〈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楊邊琳更說明伊寧事變爆發後，新疆當地的國民黨將領只會顛預地推託卸責，紛紛報告中央政府是蘇聯主導與干預。或是盛世才舊部知情不報，所以事態擴大無法收拾。這也造成當時重慶的中國中央政府對「蘇聯外力干預說」深信不

15 「同化」與「扶持」這樣的字眼出自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兩個不同版本，原文為：

「融和於中華民族的宗族，歷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這多數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和一個體系的分支，.....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合而成為一個民族。但其融和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蔣介石 1943；1944：2）。

疑，一味想要透過國際外交途徑解決東突國問題(Benson 1990: 42-66)。

王大剛同意這些內政與民族問題都是伊犁事變的背景，但是僅能算是次要輔助因素。在他書中的第四章〈伊犁事變的原因〉，一方面指出盛世才恐怖統治、國府錯誤的「大漢主義」民族政策、貪腐問題、以及中蘇邊界貿易中斷所導致的通膨；但是另一方面他更描述蘇聯直接策畫與指揮伊犁事變，像是培植維吾爾「進步知識分子」、協助在伊寧地區組織祕密團體、提供軍事訓練與武器援助、甚至宣傳「雙泛主義」的認同(Wang 1999: 88-94)。

(二) 蘇聯是否主導伊犁事變？

幾乎沒有人會懷疑蘇聯曾經提供軍事援助，否則伊犁事變不可能成功；但是，這仍舊不能解釋當地民族群體發動武裝叛亂背後的深層動機。楊邊琳認為蘇聯介入頂多停留在「默許」或被動的層次，只是催化助力，不是根本原始怨尤，她主張「變異三」的詮釋。

楊邊琳淡化蘇聯在東突國興衰所扮演的角色，凸顯出國府接手新疆盛世才政權後，不能推動有效合宜的統治。不僅在軍事上無法佔上風，在內政上直接陷入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泥淖，所以當地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而後來虛與委蛇的聯合政府，最後也無法實質分享權力，所以也無法徹底解決政爭。反過來講，楊邊琳也花費頗多篇幅，在她書中第三章〈伊寧事變的地理與歷史背景〉，說明中國中央政權並未持續控制與統治新疆，意圖強化論述新疆只是近代併入中國疆域的「類殖民地」(Benson 1990: 19-41)，所以當地突厥民族要求民族自決、進行反抗，也變得理所當然。

但是楊邊琳迴避掉蘇聯因素，並沒有探討蘇聯到底介入伊寧事變到什麼程度，真正的目的又是什麼？為什麼東突國領袖最後不反抗，放棄民族革命，讓中共解放軍兵不血刃進兵新疆，輕易向漢族政權投降？

王大剛則認為盛世才向國民黨的倒戈，才是蘇聯轉向利用新疆民族矛盾的關鍵。他在書中第四章特別指出蘇聯在中亞地區宣傳工作的突然轉變。原本在1930年代，蘇共政府總是強調幫助中國免於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勢力」的剝削，同時也要揭開「泛突厥主義與

泛伊斯蘭主義的反動真面目」。但是在1943年開始，大量以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印製的宣傳品開始在中亞地區出現，並流傳到新疆。論述內容混合馬克斯列寧主義，說明中國是一個殖民地，而新疆更是一個「殖民地內部的殖民地」，蘇聯可以幫助解放運動，同時鼓吹反漢思想，訴諸伊斯蘭不受異教徒統治的認同，並且要求民族自決，建立東突國(Wang 1999: 95-103)。

所以王大剛堅持認為伊犁事變看似源於泛突厥主義或維吾爾民族主義，但是真相卻是蘇聯創造的一個傀儡政權、或說一種假面的族裔民族意識、一個談判籌碼。完全由史達林支持與操控，功能就僅在用於平衡國府與國際列強在新疆的勢力，以交換與維繫蘇聯二戰後在遠東地區的利益。

除去第一章〈前言〉的研究文獻回顧，王大剛書中的各個章節都圍繞在蘇聯因素上，論證蘇聯介入伊犁事變的原因與目的。從攫取利益角度，在書中第二章〈新疆：土地、人民、過去〉說明蘇聯覬覦新疆天然資源，所以也要防備其他強權進入(Wang 1999: 38-45)。並在第三章〈蘇聯與新疆的權鬥1930-40〉描述新疆作為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戰略緩衝，而當時盛世才的功能就是蘇聯的代理人。也因此當盛世才背棄蘇聯，立即迫使蘇聯需要扶植另一股勢力作為替代，於是東突國出現(Wang 1999: 50-72)。

（三）東突國的誕生是列強競逐，還是民族主義的產物？

可能因為無法取得檔案資料的關係，楊邊琳一書對於伊犁事變的細節其實較簡略，也沒有多討論東突國政權運作的情形。王大剛在這個議題上則運用較多篇幅，進行檢討。

王大剛在書中第五章描述〈伊犁起義與東突國的誕生〉，蘇聯派遣所培植的維吾爾與哈薩克族菁英與軍事顧問，潛回新疆，如何與蘇聯紅軍裡應外合，殲滅國民黨軍隊，並取得勝利(Wang 1999: 119-131)。並在第六章〈東突國軍事擴張與蘇聯的節制〉，描述伊犁民族軍的北、中、南三線進攻情況，並進一步論證蘇聯對東突民族軍的控制(Wang 1999: 153-167)。

王大剛指出伊犁民族軍重要的軍事指揮職位都由蘇聯軍官擔任，而且在伊寧疑似設有蘇聯內務部的祕密指揮所，代號為「一號房子」與「二號房子」。他們不同於外交系統的領事館，直接掌控東突國軍事指揮權。所以就算伊犁民族軍已經前進到瑪納斯河，也就是距離新疆省府迪化（現今的烏魯木齊）僅剩大約100公里處，卻可以突然受命停止進攻(Wang 1999: 167-172)。背後原因就是史達林也擔心東突國勢力快速擴張，會使得局勢無法掌控；由於蘇聯已經與國府達成協議，在意的是新疆地區的資源，並無意將新疆從中國分離出去。¹⁶

在第七章〈伊犁政權對國民黨的挑戰：民族主義或權鬥？〉，王大剛分析蘇聯如何利用東突國抗衡有美國在背後支持的國民黨政府。他認為東突國菁英分成兩派：「雙泛分子」以艾力汗吐烈為代表，而親蘇的「進步分子」則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為首，而聯合政府成立後，雙泛分子被蘇聯拔除。至於在國府控制的新疆南部，突厥人士也可以分成「親蘇派」與「反蘇親美派」、以及其他的「地方山頭勢力」；親蘇派則以包爾漢為代表，反蘇親美派則是麥斯伍德、艾沙、伊敏，另外還有各地勢力，像是奧斯滿、阿里柏克、賈尼姆漢、堯樂博士(Wang 1999: 188-202)。

因此，王大剛反駁楊邊琳，認為新疆當地突厥民族其實並沒有共同的政治認同，伊犁事變並非突厥穆斯林民族主義運動，也不純粹是中國內政，應該被視作一個穿插國際列強操弄、新疆民族關係、宗教因素、國內政經利益混雜，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四）張治中的新疆省民主聯合政府無法合縱連橫不同勢力？

張治中在楊邊琳眼中算是國府貪婪政客中的例外，他受命於蔣介石，與伊犁政權進行談判，卻十分開明。他同意分享權力，包括按民族比例參政、宗教自由、限制漢人移民新疆、以及讓地方掌控更多自然礦產資源，也因此國府才能與伊犁政權共組聯合政府。

16 王柯也以當時民族軍人的回憶錄與東突國檔案做出類似的推論（王柯 2013：236-244）。

楊邊琳書中將近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描述與評價聯合政府，從第五章〈1946的新疆聯合政府〉、第六章〈1947.1-7的新疆聯合政府〉、第七章〈聯合政府崩解後的新疆，1947-1949〉，盡量詳盡地描述聯合政府結構、問題與運作情形。

張治中在聯合政府的角色，被楊邊琳描寫成是一個衝突中的緩衝調解者(conciliator)，拉扯住國府與東突國兩個無法妥協的勢力，並調解內部派別的競合關係；他一方面要處理新疆金融秩序崩壞、失業、貪腐與軍紀等等日常民生難題，另一方面還要調配人事與政治任命，促進「民族團結」(Benson 1990: 82-103)。但是，隨著張治中1947年調離新疆，由麥斯武德接替，他與當時國民黨的CC派可能有扞從關係。因此，脆弱的聯合政府控制權等於完全交回給國府由宋希濂領銜的強硬派，由效忠國府的維吾爾菁英與漢族軍人一起接手，而伊犁菁英再也無法插手實質事務(Benson 1990: 105-136)；聯合政府權力完全旁落，不同勢力彼此的信任盡失。

王大剛也在第八章〈張治中的策略與成立新疆聯合政府〉、第九章〈新疆省聯合政府的瓦解〉、以及第十章〈新疆兩個政府1946-49〉，也用很長篇幅，嚴肅討論張治中面對蘇聯主導的東突國政權，如何主持新疆民主聯合政府。

王大剛認為張治中的策略就是讓蘇聯認知到既有利益不受威脅，不讓英、美勢力在新疆擴張，同時推動新疆當地政府的民主改造、大幅納編伊犁政權的菁英進入聯合政府、解決經濟民生問題，以求創造出一個各個民族都能和平共處的環境。王大剛認為張治中代表國府，得到蔣介石的授權，在新疆推動親蘇綏靖的策略。他們都理解蘇聯把新疆當作自己的勢力範圍，如果忤逆史達林的意願，將會給當時戰後的國府增添更多的麻煩，而蔣介石在處理東北、外蒙古、以及中共問題上已經焦頭爛額(Wang 1999: 225-247)。

但是事與願違，雖然東突國名義上解散，納編進入聯合政府，但是實質上卻獨立運作，成為「國中之國」(Wang 1999: 321-335)。也因此，新疆聯合政府內部離心離德，各派干戈不斷，幾乎完全沒有互信。

再者，親蘇勢力不斷向南擴張，王大剛分析伊犁政權把聯合政府當作權宜之計，伊犁政權最終目的有二：一是南擴，透過民族情緒，逐漸拔除地方親國民黨的維吾爾菁英；二是逐出國府中央軍，各地建立民族軍取而代之。但是，這樣的企圖也遭受新疆國府陣營反蘇親美勢力的反制，期間爆發迪化225事件、吐鄯托事件、北塔山事件，進行血腥對抗。張治中無力收拾局面，只有辭職(Wang 1999: 260-292)。麥斯伍德繼位後，東突國親蘇菁英於是撤出，聯合政府瓦解，自此東突國的伊犁政權與迪化的聯合政府其實自行為政。

(五) 中共順利接管新疆的意義？

楊邊琳對中共與新疆，以及中共與伊犁政權的關係並未多加討論，而王大剛在書中第十一章〈中共和平解決新疆問題〉，回顧了中共組織與新疆的關係，以及最後人民共和國如何和平併入新疆。

王大剛特別指出中共與伊犁政權唯一的來往關係就在阿巴索夫。他作為一個伊犁當地孚眾望的領導人，卻不完全被蘇聯信任，導致他與親蘇派的阿合買提江有著競合的微妙關係；而阿巴索夫個人傾心於中共的政治理想，曾經利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時，聯繫上董必武，並私自在東突國組織人民革命黨（後改組成為民主革命黨）。但是由於蘇聯的反對，只是地下黨，同時卻也是東突國主要政治組織「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的骨幹。鄧力群曾經感嘆，如果阿巴索夫在前往北京參加政協會議的途中，不遭遇空難，應該對新疆融入中國會有很大的幫助(Wang 1999: 352-362)。

王大剛並在第十二章〈結論〉，總結蘇聯在伊犁事變與東突國興衰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中共接管後的態度。他提到毛澤東論稱伊犁政權為「三區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只是偽辭，目的是在清除蘇聯在新疆的影響(Wang 1999: 407-413)。如果從實踐共產主義的角度考量，東突國的伊犁政權在根本上並不符合革命的要件；不僅缺乏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沒有清楚的土改政策、同時又與地方封建階級結盟同流合汙。

王大剛認為新疆問題必須放在蘇聯的遠東政策脈絡下來思考，不

是單獨存在的，牽涉到蘇聯治理中亞的策略，以及蘇聯在亞洲接壤地區的利益(Wang 1999: 414-418)。因此，蘇聯不見得非要扶植「新疆獨立」，這樣反而可能會給蘇聯中亞民族做出一些負面的啟發，而真正重點是經濟利益。既然中共願意繼承國府的態度，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將英、美勢力排出中國大陸，承認蘇聯在新疆的特殊地位，也就無需繼續在中亞邊境，也就是新疆，維持一個「國中之國」的傀儡，製造與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緊張關係。

對照比較楊邊琳與王大剛的論點，可以說兩者在邏輯上是「變異三」之於「變異二」，完全背道而馳。他們研究的貢獻分別在於直接暴露國府與中共不願碰觸的部分，然而他們的研究依循各自的論述邏輯，也有不足之處。

楊邊琳的缺陷一方面在於沒有深究蘇聯因素介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族裔政治上，也沒有深究新疆「族際關係」，東突國只是維吾爾民族主義主導的一種政治認同，並不能含括與消弭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白俄歸化族、東甘／回族之間的齟齬。歐亞大陸上的泛突厥主義其實穿插著各種不同內涵的認同，在政治上充斥各種愛恨情仇的糾結矛盾。¹⁷就算在當時，伊犁維吾爾菁英也沒能透過成立東突國，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策略來黏合其他這些不同族裔，去除嫌隙，塑造一個統一的政治認同。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烏斯滿，作為一個哈薩克族領袖，統領三區之一的阿爾泰，卻與伊犁政治菁英格格不入。¹⁸於是東突國實際上只是反映一種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並非能夠完全吸納其他新疆當地突厥族裔，更遑論其他民族的政治認同與效忠。

17 有批評者認為楊邊琳撰寫這本著作時，似乎並不完全理解歐亞大陸上突厥族裔的歧異與多樣性，總以為他們在語言、文化、宗教信仰上的同質性很高。參見(Lipman 1990: 894-895)，以及(Gladney 1993:598-600)。

18 關於烏斯滿與東突國在政治理念上的齟齬不協調、不認同，或許可以歸結於他對蘇聯的不信任，以及他為守護當時阿爾泰地區的哈薩克族遊牧社會結構。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少，王柯對相關議題在第七章〈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接合點：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勢力擴張的蘇聯背景〉也有所著墨（王柯 2013：211-220、296-298），另外也可以參見（管志翔 2013：19-30）。

王大剛這本專著則很像是一本鉅細靡遺的伊犁事變與東突國歷史手冊；他走訪多國，蒐集更多原始檔案與二手材料，並且接觸過較多東突國事件相關人士，進行訪談，討論涵蓋各種相關議題。然而，這本專著的缺失就是在關鍵論點上，沒有直接引用檔案材料，卻引註頗多中國大陸出版的二手研究文獻，像是相關人士回憶錄、新疆烈士傳通訊以及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使人質疑論點的可信度。當然也不能排除他或許想間接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駁斥中共建政初期「變異一」講法。還有另一個值得商榷的是該書的書寫體例，王大剛不斷在書中註釋引用自己的博士論文(Wang 1993; Benson 2002: 277-280)，¹⁹而掩藏原始材料的出處，這當然不是一本嚴謹的研究著作應有的形式。

四、王柯——虛飾「變異四」卻偏向「變異二」的論證

王柯這本專著是由他的日文版博士論文（王柯 1995）翻譯成漢語，並添加第一章〈在「烏瑪」與「中華」之間：清王朝對新疆維吾爾族社會的統治〉，²⁰以及補充晚近一些中國大陸二手研究材料，改寫而成。可能因為日本學術訓練強調的方向不同，不似歐美特別講究全書論點的貫穿一致性，所以王柯的書寫方式予人多條論點同時進行的感覺，引證資料非常充分，主題當然是圍繞在東突國，但是論述卻不是單一主軸。因此，綜觀全書，王柯一方面論述「雙泛」與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時序上幾乎同時與蘇聯勢力進入新疆，但是另一方面又強調蘇聯籌謀、又直接參與發動伊犁事變；所以他的論點勉強可以算是「變異四」混入「變異二」；而「變異四」是背景，「變異二」才是現實狀況。

19 據筆者側面瞭解，王大剛在博士論文中使用的一些藏於北京與烏魯木齊的歷史檔案材料尚未公開，在無意冒犯中國官方的前提下，似乎刻意隱匿，但是這仍然不能開脫該書與學術體例不符的事實。

20 該章的初稿原為日文，參見（王柯 1998）。

全書首先描繪十九世紀末新疆建省改制納入中原政體之際，中亞區域國際形勢丕變，不僅俄、英、日、美強權勢力滲入，泛突厥主義也開始輸入新疆，並且配合伊斯蘭宗教，嘗試塑造並黏合出一個新的、不相融於中國的民族認同。蘇聯於是利用新疆內部族裔認同的歧異與矛盾，與盛世才政權反目後，發動伊犁事變，透過東突國作為籌碼，與中國政權換取自己在新疆最大的利益。

因此、相對於楊邊琳與王大剛的書寫方式，將論點分別向內收緊成為「變異三」與「變異二」，王柯的論述反而向外分開，引用一些不同的資料，至少拉出兩條相關的線索，也很可能是概念上的誤解。

（一）「雙泛主義」與民族認同

相對於楊邊琳把新疆簡化成近代中國政權的「殖民地」，王柯第一章與第二章拉出歷史的縱深。透過描繪大清帝國治理新疆格局的限制、維吾爾民族主義藉「東突認同」而出現、新疆當地某些穆斯林菁英的烏瑪想像、以及新疆建省改制卻無法安頓並重塑國族認同的背景，使人期待在該書後面的章節能夠在紮實的史料輔佐下，透過新疆東突國的案例，討論現代中國民族主義如何遭遇並衝撞維吾爾民族主義所主導的東突建國運動。進而檢討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成果，甚或對當代民族主義理論研究框架提供一些新的啓示。

但是王柯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並沒有多所著墨，只有在書中〈前言〉與〈後記〉點到為止地暗示，近年在新疆發生騷亂的源頭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東突國運動，而背後支撐的意識形態就是「雙泛」（王柯 2013： xi-xii、 326-327）。這樣的講法首先太過流於「以古喻今」之嫌，在方法論上出現瑕疵。再者也並未討論並釐清他所理解的「雙泛主義」內涵。

如果1884年新疆建省到1933年第一次東突國，以及1944第二次東突國成立，這段約半個世紀的時間，因為各種國際與國內的原因造成重塑中國國族認同失敗，那麼從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到現在，又為何新疆民族問題仍然紛紛擾擾？我想這不能簡單地歸結在「雙泛認同」而跳躍帶過。如果把中原王朝作為中國主體，二十世紀

初執政者意欲將大清帝國的版圖生硬地嵌入現代民族國家結構，在轉換的過程一定會遭遇政治認同不一致的困境。就算時至今日，也很難論斷這個過程已經結束。這當然在理論與實務上，牽涉到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否能夠有效管理族裔衝突，以及其他相關繁複的議題。事實上，王柯曾經專門為文論著天下、民族國家，以及大清帝國與近代中國國家結構遞嬗相關問題，²¹企欲闡釋中國轉型成民族國家的過程。但是在那些論著中，依然沒有從「少數民族」的視角，系統性地分析並檢討為何中國國家結構與民族主義論述至今無法成功安頓這些不同族裔。

「雙泛主義」作為官方論述新疆當地民族分裂主義的話語，語意更是被過度簡化，把歷史做削足適履的套用。在中國官方文獻與學者著作、以及在王大剛與王柯的專著中，「雙泛主義」被賦予三層語意，大致可歸納成：第一、「雙泛主義」作為當地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起源或意識形態，最終目的是建立東突厥斯坦國；第二、「雙泛主義」指涉那些亟思將新疆從中國分割出去的「政治勢力或人物」；第三、「雙泛主義」作為新疆社會一般底層群眾的「動員工具」。

王柯在書中並沒有系統地對雙泛主義進行論證，相關描述散見於各章。綜合來講，他有意或無意地透過歷史例證的描述，重複這三種語意的描述。但是，如果細緻地挑揀、並解讀散落在書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關於「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的關係，則可以發現兩者明顯有著不協調的歧異，甚至對「雙泛主義」可以作為一個「二合一」集合概念進行反噬。²²

21 王柯關於民族與國家相關的系列討論，多以日文出版，並隨後有中文譯本，可參見（王柯 2005；2006；2007；2015）。

22 中國境內研究新疆現代史卻不願正視這兩個主義間其實互相難以協調的問題，似乎還有意地曲解扎吉德運動(Jadid)作為雙泛主義在新疆的源頭，例如潘志平(2014)。扎吉德運動在十九世紀末作為一種進步主義觀，企欲調和所謂雙泛的兩種文化內涵。當時歐亞大陸上的突厥知識分子希望透過新式現代化教育，一方面塑造大突厥民族想像，另一方面意圖將伊斯蘭宗教進行轉化，不再扮演傳統政教權力擁有者，而變成維持社會道德與秩序

王柯在第一章介紹大清帝國的治理格局。討論新疆作為大清帝國的一個「藩部」，一種「盟友」，用以牽制中原地區龐大的漢族子民。當時新疆設立「伊犁將軍」的軍府制度，將帝國的漢、回社會進行隔離，一方面軍隊統帥權設計為「旗缺」，抓在八旗人手上，另一方面在民政上則因地制宜，特別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綠洲設置「改良型伯克制」。²³把地方上大衆日常相關事務的管理權力交給當地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以一種「以夷制夷」的方式進行間接控制與管理。「伯克」負責草根地方的行政，但是職務不能世襲，同時剝奪和卓與阿訇等宗教人士擔任「伯克」的權利，以遂行「政教分離」（王柯 2013：4-14）。

這樣對歷史的闡述其實傳承日本的東洋史傳統，²⁴在近年美國學界所提出的「新清史」也有著類似的口吻；²⁵認為清代滿族對中原四周邊疆的管控，並不能與前朝相提並論，不能倒古為今地將一些各個朝代的政治史概念「一般化」，像是「朝貢」、「改土歸流」等概念，不應該在不同脈絡裡等同齊觀地硬套。滿清帝國有著特有的政治格局，應該去除單一「漢族中心」的史觀。

清朝的伯克制度攏絡住南疆地方的上層階級，固然有利於地方政務推動，但也容易導致吏治敗壞，引起統治危機。王柯也論述清代新疆的政治制度並不能杜絕「伯克」與中央派任的地方官員勾結。由清廷中央直接派任的辦事大臣、領隊大臣，他們有權監督，甚至直接參與民政事務推動，也兼管伯克升遷黜陟，所以常有與當地伯克相互勾

意識的規範。也因此當時傳統的伊斯蘭上層宗教人士對扎吉德運動非常反感，扎吉德與伊斯蘭教士其實關係相當緊張；可參見(Khalid 1998)。

23 清代新疆的伯克官職約有三十餘種，官階品級為三品到七品，主要設置於南疆人口密集的喀什、葉爾羌、和闐。

24 日本史學界對新疆做出這樣類似口徑的研究傳統可參考（羽田明 1982）、（佐口透 1971）的著作。

25 美國新清史已經成爲一種顯學，可以參考路康樂(Edward Rhoads)、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羅友枝(Evelyn Rawski)，至於清代新疆也可參考米華健(James Millward)的研究。對新清史發展背景最簡明的介紹，參見衛周安(Waley-Cohen 2004: 193-206)。

結、賄賂庇縱的狀況。也因此不時就有不同新疆地方政治勢力藉機發動宗教聖戰。透過伊斯蘭宗教信仰的網絡，向底層一般被壓迫的平民大眾，訴求終結「異教徒」統治，而來自浩罕的「阿古伯之亂」就是最好的例證。

大清帝國從一開始征服新疆時，就面對伊斯蘭宗教結合地方政治勢力，有著白山派與黑山派的爭鬥。這樣的教派勢力鬥爭後來也用以動員群眾，向大清帝國的新疆統治階層發動叛亂（王柯 2013： 2-4、12-20）。在這個歷史的脈絡中，只能發現伊斯蘭宗教不同教派互鬥，並作為政治勢力動員的工具，以對抗來自中原王朝的統治。王柯拉出伊斯蘭教在清代新疆歷史的縱深，應該是要強調宗教信仰在當地根深蒂固；但是也不能排除他是要暗示「泛伊斯蘭主義」的基礎。可是當時「泛突厥主義」的概念根本尚未出現，所以當然不能以「雙泛主義」作為飾詞，否則當然就是一種時空倒置的錯誤(anachronism)。

在第二章〈「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起源：運動產生的社會背景與發生型態〉，王柯檢討「東突厥斯坦」不是清楚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源頭則是土耳其與喀山流入的「泛突厥主義」，並在二十世紀初新疆透過新式學校教育而四處傳播。這在第一次東突國出現時，發現三個特徵：那就是訴求「反漢」情緒、推動維吾爾文化啓蒙運動、再加上黏著不同社會階級背景的伊斯蘭宗教，呼籲建立烏瑪宗教國，以進行政治動員（王柯 2013： 27-36）。新疆當地社會菁英受到十九世紀的韃靼知識分子影響，原本用以對抗「泛斯拉夫主義」的「泛突厥主義」，搖身一變成爲定位自己文化與政治走向的基礎。不過「泛突厥主義」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情緒仍只是少部分社會菁英的理解與想像，一種意識形態；只是「一泛」，沒有「雙泛」。

第二次東突國的動員情形則見於第五章〈蘇聯支持的中國突厥系伊斯蘭民族居民的「聖戰」：第二次獨立運動爆發和伊寧起義〉。維吾爾族菁英透過宗教領袖，以伊斯蘭教號召群眾獻身，推翻異教徒統治，參與東突民族革命（王柯 2013： 139、146-150）。這裡再次明顯暗示，「泛突厥主義」的東突建國運動，或維吾爾民族主義都不能作

為有效動員群眾的工具。維吾爾族社會菁英受到蘇聯民族識別與概念的影響，把新疆轉變成東突厥斯坦，作為一種民族政治認同，進而推行出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但是，這樣的民族認同與新疆群眾切身實際的綠洲或地域認同有很大的隔閡。然而為求遂行菁英的民族革命理想，他們必須委身於伊斯蘭宗教進行動員。也就是說，「雙泛主義」最多只是一種政治妥協，或政治操弄的動員工具，很難講是一個成功地意識形態整合，甚至隨時都可能分道揚鑣，所以也不能作為一個穩定持續的複合政治認同。

王柯似乎企圖從中原王朝的角度，反省就算在十九世紀末透過新疆建省、就算政治改制，也無法快速扭轉當地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以及相應的認同，情況反而持續惡化。當時新疆省級與縣級的官員仍然把持在漢族手裡，而縣以下的鄉、村則由維吾爾族負責，而任務主要是管理低階的行政、水利、司法審判。而類似地方鄉紳與地主的「阿克薩卡爾」(ak-saqal)則直接面對人民，輔治理理（王柯 2013：40-45）。這樣的制度隨著吏治腐敗與財政惡化，累積民怨，一旦獲得曾經與國外接觸過的新興知識分子與宗教人士，就迅速引爆。

換句話說，從歷史剪裁出的「雙泛主義」，它的生存環境在於一種官逼民反的政經腐敗環境。而且如果新疆社會開始與外部世界接觸，很快就有可能透過「雙泛主義」的兩種意識形態對當地菁英與群眾進行動員。

第六章〈權威與權力：戰時體制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政治結構〉描述東突國建立後，內部不同政治權力的配置。其中伊斯蘭宗教人士佔有重要的位置，像是推舉艾力汗吐烈擔任東突國總統，都是基於考量他的宗教身分背景（王柯 2013：173）。而且宗教人士曾經一度想要擴權，例如在東突國政府部門設立宗教顧問，擁有與蘇聯顧問同等的權力，並在民族軍中任命阿訇擔任副團長，還有設立伊斯蘭宗教法庭（王柯 2013：184-185）。於是，在王柯的筆下，似乎東突國中偏向「泛伊斯蘭主義」勢力被挺立凸顯出來。

同時，王柯特意將艾力汗吐烈所代表的宗教勢力，與東突國民族

主義人士進行區分。艾力汗吐烈一派堅持「民族獨立」到底，而「親蘇知識分子」則似乎願意在蘇聯的帶領下與中國政權進行妥協。在這樣的書寫暗示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中國大陸學者厲聲的二分法：「雙泛分裂派」相對於「民主革命派」，前者只要獨立，後者卻可以納如中國革命的大旗下。王柯花費很多篇幅在第九章演繹「民族獨立」的內涵，以區分「艾力汗吐烈一派」與「親蘇知識分子」；兩者的差別是前者指一味頑固要求「民族獨立」，但是後者強調最終目的應該在追求「民族平等」與「民族解放」，然後可以得出一種「民族主義階段論」的講法（王柯 2013：262-268）。

王柯沒有直接點明它自己的二分法，是否可以作為是否為「雙泛主義」的區分，所以也不能確定厲聲與王柯的論點是否互相附和。²⁶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當時蘇聯決定要與國府和談，「艾力汗吐烈一派」不願接受，而「親蘇知識分子」則願意接受。這也造成艾力汗吐烈最後被蘇聯祕密押離伊犁，送往中亞囚禁的命運（王柯 2013：284-285）。換句話說，這最多只能推導出「艾力汗吐烈一派」勉強算是「直接雙泛主義」，而「親蘇知識分子」期望透過蘇聯的幫助與帶領，採行「間接民族獨立」或「間接雙泛主義」。兩者最終都要建立東突國，前後者的差別只是對於伊斯蘭宗教信仰的虔誠度，牽涉到他們利用宗教進行政治動員的能力，以及是否接納蘇聯主導的建國路徑。

「雙泛主義」指謂的「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主義」，其實是兩套認同體系，只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才開始匯合。披上「泛突厥主義」的外衣，很可能是因為維吾爾民族主義太過狹隘，但是最多還是停留在某種菁英層面認同的意識形態，沒有辦法有效向下動員群眾。於是匯合伊斯蘭信仰，被給予「泛伊斯蘭主義」的稱號，達到對

26 王柯關於東突國內部政治勢力這樣的二分論述其實很有爭議。曾有日本學者、生活在土耳其的維吾爾族知識份子，分別告訴筆者，這是王柯選擇性地運用史料。他們當然承認當時的東突國維吾爾政治菁英受到蘇聯的影響，也會使用類似共產主義討論民族革命的用詞與口號，對政治行動進行闡述。但是這並不能證明他們對於民族革命與民族平等的追求，在實務上，可以有如厲聲所述，被翻轉成真有意願或可能與中國漢族政權匯流，甚至政治統一。

社會底層進行有效動員的目的。因此，所謂的「泛伊斯蘭主義」在當時比較確定的意義，應該是遂行維吾爾民族主義的「工具」。除非是官方有意製造的政策論述，否則在歷史研究上，並不應該簡化，將「泛伊斯蘭主義」任意與「泛突厥主義」合成為單一概念的「雙泛主義」。更難以將這個概念用以指涉某一股單一政治勢力或個人。

在這樣對「雙泛主義」的理解背景下，王柯拉出「變異四」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興起與蘇聯介入並起糾結的可能性，就變得無足輕重；雙泛主義只是一個假議題，一個被政治權力利用的工具。

（二）國際勢力主導新疆分離運動

如果屏除那些零散關於「泛突厥主義」以及「泛伊斯蘭主義」的討論，王柯基本贊成「變異二」的論點，認為蘇聯主導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並介入伊犁事變與東突國的建立。新疆在當時是否能脫離中國而獨立，也的確需要考量弱肉強食的國際勢力範圍之爭，國際政治於是成為伊犁事變的另一條論述途徑。王柯討論蘇聯參與伊犁事變，或說擴大一點，國際勢力干預新疆政治的口徑，其實與王大剛類似。除去強調蘇聯直接介入，另外也額外切入三個新議題：那就是日本對新疆的企圖、蘇聯與盛世才的關係，以及伊犁政權內部菁英的權力爭奪。

王柯在第三章〈反日親蘇路線的表與裡：盛世才的政治路線與新疆民族問題〉，回顧日本對新疆曾經有過的企圖。他評估昭和對新疆沒有直接的領土野心，只是擔心蘇聯一旦控制新疆，可能威脅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特殊利益與地位」。也可能基於這樣的考慮，在中日戰爭頻臨爆發時，日本軍部開始有人計畫把新疆當成「勢力範圍」（王柯 2013：56-63）。王柯也討論盛世才反日的態度，他認為是受到郭松齡與馮玉祥的影響。同時由於國府對盛世才的態度曖昧，遲遲不願公開明示並承認他擔任「新疆邊防督辦」的職銜，又袖手旁觀他與馬仲英之間的戰事，使得盛世才選擇倒向蘇聯。這樣可以藉蘇聯之力壓制住當時第一次東突國的各方民族勢力，否則蘇聯也可能選擇支持新疆其他山頭勢力，像是和加尼亞孜、堯樂博士、馬仲英，他們都有可能危及盛世才在新疆的權力基礎（王柯 2013：64-74）。

在題名為〈政治權利²⁷的雙重結構與民族問題：盛世才政權時期的政治路線與民族政策〉的第四章，王柯更仔細地描述盛世才藉由蘇聯的底蔭幫助，重整新疆的軍隊、行政、經濟、民族問題，同時模仿蘇聯處理民族問題的方式安撫新疆各民族勢力。由於盛世才不願大權旁落，才勉強與蘇聯共同治理新疆。換句話說，盛世才與蘇聯為當時新疆政治的兩股勢力，互相競合。所以，盛世才為求鞏固自己權勢，隨時就會趁機排除異己，在1937與1940分別發動大清洗，逮捕並整肅蘇共與中共的人員，而新疆當地民族菁英也在列，這都埋下第二次東突國大規模民族衝突的引線（王柯 2013：86-93、102-112）。一旦盛世才與蘇聯反目，民族問題就被蘇聯引爆。

雖然蘇聯對新疆不見得有領土野心，但是為求管控盛世才，多管齊下。蘇聯派遣顧問、加上駐迪化總領事的現場監控、以及組織「新疆民衆反帝聯合會」動員群眾、設計「省政府政治監察總管理局」作為秘密警察、「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邊務處」負責情蒐，都使得盛世才心生嫌隙（王柯 2013：94-102）。蘇聯與盛世才其實是一種互相利用的共生關係，但是彼此信任都有限；所以等到盛世才倒戈朝向國府，蘇聯就扶植東突國，以染指新疆。

王柯在第五章至第九章討論伊犁事變與東突國的興衰，相對於楊邊琳與王大剛，他較少著墨聯合政府，也沒有檢討英美勢力涉入與國府在當時新疆政治中的情況。王柯側重在描述東突國內部不同菁英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們與蘇聯的關係。

在第五章與第六章，王柯介紹當時東突民族解放組織的文件《我們為什麼要奮鬥》，闡述東突獨立運動的國家論述。其中主要的內容就是希望將不同突厥系族裔集合到「東突厥斯坦」的國家概念下，呼籲推翻中國在新疆的漢族政權，建立親蘇的政權（王柯 2013：126-131）。世俗的維吾爾族政客與知識分子也瞭解透過伊斯蘭宗教動員群眾支持的重要性，於是主動吸收並推舉宗教人士伊力汗吐烈為民族

27 書中標題誤植為「權利」，參照章節內容與副標題，應該改為「權力」。

解放組織的主席（王柯 2013：136-139）。最後在蘇聯的軍火武力支援下，成功發動伊犁事變。

王柯在書中第六章的論點基本與王大剛類似，分析東突國權力結構與功能，認為臨時政府主要有兩股勢力；一是宗教人士以及傳統社會的地方鄉紳勢力；另一則是親蘇維吾爾知識分子以及蘇聯籍人士。但是王柯進一步分析，前者的功能在於鞏固政府權力的社會正當認受性，例如讓艾力汗吐烈擔任政府主席，阿奇木伯克和加擔任副主席。而後者與蘇聯密切合作，負責管控軍情單位，例如阿巴索夫則掌管內務部，也就是警察與檢察機關。至於民族軍系統的主官，像是總指揮、團、營籍幹部就多由蘇聯籍的人士擔任。這兩股勢力其實並不融洽，在政府部會中，也都設有蘇聯顧問與宗教顧問，下達命令都要經過他們一致同意。宗教傳統人士需要蘇聯的武力援助，而蘇聯則需要宗教傳統人士掩蓋干涉中國主權的事實，於是東突國形成一種兩元共存體制（王柯 2013：170-192），但是事實上權力是由宗教人士、知識分子與蘇聯顧問，三者共構而成。

進一步延伸，由於宗教人士與知識分子各有功能，蘇聯其實操作這兩股並存於東突國統治層的政治勢力。換句話說，這兩股政治勢力無論是否以混亂的「雙泛主義」論述話語予以定義，他們都涉及被外力干預。有鑑於兩者偏重與堅持的意識形態與信念不同，他們的群眾動員目標與能力也不盡相同，對於如何達到獨立建國的途徑也有不同。在政治實務上其實常有分合與爭執，並不見得一定能一致行動。

如果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東突獨立運動是世俗政治人物主導，並爭取宗教人士透過伊斯蘭信仰進行政治動員，進行與中國異教徒政權進行對抗，那麼當前全球反恐戰爭後新疆發生的紛紛擾擾，反而呈現出世俗政治人物與宗教勢力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現象。世維會礙於國際政治普世規範操作，以及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反而極力與極端的東突伊斯蘭組織，像是東伊運或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劃清界線。²⁸

28 當前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的世俗派與伊斯蘭宗教派互相的對抗與競合仍然方興未衰，相關初步的反省與素材，可見待建宇(2014, 2015)。

至於同被劃歸親蘇派的阿合買提江與阿巴索夫，他們的關係其實並不清楚。王大剛認為蘇聯比較信任阿合買提江，但是王柯並沒有討論。只是在第九章〈「民族獨立」還是「民族解放」：「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消亡〉，比較詳細的描述艾力汗吐烈極力反對與國府的和談，而阿合買提江與阿巴索夫則都願意妥協，接受蘇聯設定的談判議程（王柯 2013：262-286）。但是綜合兩書的討論，似乎可以大膽猜測阿合買提江比較願意接受蘇聯的指導，以迂迴方式，透過聯合政府，不用武力，繼續開展「民族革命」，將伊犁政權的勢力向南疆擴散。阿巴索夫則企圖與中共建立關係，將伊犁事變導向「共產革命」（王柯 2013：354-356），這或許是阿巴索夫先後私自設立「東突厥斯坦革命青年組織」、「東突厥斯坦革命黨」的背景原因（王柯 2013：277-278），整建具有鼓吹與實踐共產主義性質的政黨。於是，世俗的民族主義勢力還可以一分為二，成為親蘇與親中共兩派，然而，這樣的推論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回顧兩次東突國的經驗，如果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獨立運動都是由維吾爾民族主義世俗政治人物主導，並爭取宗教人士透過伊斯蘭信仰進行群眾的政治動員，與中國異教徒政權進行對抗，最後的分道揚鑣其實是緣於蘇聯的介入，那麼當前全球反恐戰爭後新疆發生的紛紛擾擾，反而呈現出世俗政治人物與宗教勢力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現象，應該仍然是國際勢力介入的原因。

國際勢力從來沒有停止介入，並利用世俗與伊斯蘭宗教兩股勢力的矛盾，為自己牟利。例如美國在中東、甚至蘇聯入侵時的阿富汗，都曾經選擇能夠為其所利用的政治勢力進行結盟。簡單來講，美國曾經扶植過埃及的沙達特、穆巴拉克、甚至兩伊戰爭時伊拉克的沙達姆胡珊，經由這些世俗民族主義政權對抗與美國為敵的伊斯蘭主義勢力與政權。但是蘇聯入侵阿富汗時，美國又經由巴基斯坦（據傳也曾途經新疆瓦汗走廊）軍援盤據阿富汗北部的伊斯蘭主義軍閥。只是阿富汗伊斯蘭主義勢力後來重新排列組合，與蓋達組織結盟，發動911攻擊，才與美國反目。這些反美的伊斯蘭勢力，他們的基本信仰教條就是要摧毀邪惡的美國，才能復興阿拉伯伊斯蘭文明。

從這個角度，美國也在操弄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美國民主基金會金援流亡海外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很大的目的在於清洗流竄在新疆境外維吾爾社群中的伊斯蘭宗教勢力，把他們侷限在中亞、土耳其與阿拉伯世界，不要在西方世界參與蓋達鼓吹的聖戰，進行串聯。世維會在美國的扶植下，參與有限的國際關係運作，所以也因此礙於國際政治普世價值的規範，以及與美國的經援與友好關係，反而極力欲與所謂的極端東突伊斯蘭組織劃清界線，將他們壓制住並邊緣化，不要阻礙世維會代表維吾爾族在國際間活動。至於維吾爾反抗中國的伊斯蘭主義勢力（中國官方稱作「東突厥伊斯蘭運動」或簡稱「東伊運」）與阿富汗塔里班，以及蓋達結盟，於是理所當然成爲美國的敵人（侍建宇 2011a；2011b）。甚至中國官方公布的三個東伊運恐怖分子主謀，都是由美國以無人飛機炸死於阿富汗境內。

如果將蘇聯對東突國的介入比擬成美國操弄世維會與東伊運（雖然這樣的類比在方法論上不見得適當），可以發現二戰後的國府與中共政權當時似乎表面上都願意接受蘇聯介入，一直到晚近才開始翻案；而現在透過反恐戰爭，當前的中共政權也似乎樂見美國阿富汗對付維吾爾伊斯蘭主義勢力；甚至將「雙泛主義」還主動調整，變成「三股勢力」的政策論述，進行附和。但是，這樣接納國際勢力介入新疆議題的邏輯卻有詭異。這是否等於默認美國某種程度上已經並可以參與新疆的民族政治（雖然中國絕對不會承認），但是至少不能否認，美國在境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上有一定的主動權，成功地分割維吾爾世俗民族主義與伊斯蘭宗教勢力，在過去十年的全球反恐戰爭中爲其所用。在實務上，美國目前無意插手新疆內部事務，但是中共在新疆治理的倫理層面上，卻變得進退失據，可以被國際勢力從外部遙控，進行牽扯。

五、結語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研究一直穿插著政治力的干預。相對於國民黨政府歸咎於蘇聯侵略新疆的野心，中共則不願意全盤否定「三區革

命」的講法，但又要兼顧雙泛、蘇聯干預的史實，現在提出的論述就只能變得模糊失焦。當然中共官方這樣的做法，也不排除參雜著借古諷今，有著當前民族政策上的考量，目的在壓制維吾爾民族主義，分裂中國的思維。

至於學界詮釋伊犁事變與東突國的出現與發展，則層次較為豐富。楊邊琳揭露國府的虛矯，忽視處理新疆民族問題上的失誤。王大剛更清楚指出蘇聯從頭至尾主導參與事件的過程，而王柯的論述則似乎企圖進一步的點出更深層的困境，那就是源於國家結構轉型所導致的民族與國族認同的錯亂，以致給予其他國際強權可趁之機。

歷史學界對於東突國的研究當然受限於相關國家官方檔案公開的情形，這會影響研究者能夠利用什麼材料，進而企圖與那些對象的什麼論述展開對話。歷史不是絕對客觀的編年紀事，歷史本身都有著現實的意義與功能。那麼對東突國進行的歷史學研究，就會依據研究者的意願、所掌握的素材而有跨領域的對話對象。

楊邊琳、王大剛、王柯的研究與對話對象基本上是朝向不同的官方歷史論述。楊邊琳對話的對象是國府，她以「變異三」批駁「變異二」的論述。王大剛則剛好相反，他則以「變異二」針對楊邊琳的「變異三」，同時又間接反駁國府與中共原有論述的不足之處。王柯雖然企圖拉出大清帝國歷史格局的縱深，一度給人期盼可以套脫出與官方論述正反讚駁的討論，換一個新疆地方民族的視角來書寫並檢討東突國的歷史。但是他最後還是纏繞在不同內涵的、有著很大歧義的「雙泛主義」論述概念中，沒能跳脫出「變異二」的格局。換句話說，這幾本專著都沒能跨出只與官方論述商榷的史學研究，沒有與其他學科直接接壤，並進行對話。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東突國歷史研究的檔案，王大剛的著作頗有隱藏資料來源之嫌，在關鍵論點上刻意隱瞞出處，都以引用博士論文帶過，而王柯的著作則相對公開，引注完整。可惜的是，並非所有的研究者都可以如王大剛與王柯一樣登門入室，直接接觸收藏在中、俄兩國與伊犁事變、東突國的相關檔案，這也使得我們無從根究他們運用與闡述史料的精確度，甚至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與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編。2010。《新疆工作文獻彙編(1949-2010)》。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2013。《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白振聲、鯉淵信一主編。1992。《新疆現代政治社會史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朱家驊。1970。《世界文化的前途》。臺北：雲天出版社。
- 沈志華。2013。《俄國解密檔案：新疆問題》。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1999。〈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第三期，頁213-229。
- 吳啓訥。2010。〈新疆現代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期，頁156-162。
- 侍建宇。2011a。〈評《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中國的伊斯蘭武裝分子與全球恐怖主義威脅》——兼論美國對應跨國維吾爾民族主義的策略〉，《香港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第三卷，頁116-124。
- 。2011b。〈維吾爾離散眼中的拉登之死與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香港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第三卷，頁125-137。
- 秦孝儀編。198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 陳慧生、陳超。1999。《民國新疆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盛世驥口述，歐播佳整理。2000。《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臺北：萬卷樓。
- 張大軍。1980。《新疆風暴七十年》。臺北：蘭溪出版社。

管志翔。2013。〈結構、現實需要與文化傳承——以烏斯滿的行爲邏輯和社會互動爲例〉，《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第一百四十六期，頁19-30。

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編撰。1998。《新疆三區革命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蔣介石。1943；1944。《中國之命運》。重慶：正中書局。

厲聲等著。2003。《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潘志平。2014。〈俄國韃靼斯坦「扎吉德」運動與近代維吾爾啓蒙運動——新疆「東突厥斯坦」運動的緣起〉，《西北民族研究》第三期，頁23-34。

薛銜天。2003。《中蘇關係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二、外文書目

王柯。2007。《「天下」を指して：中国多民族国家の歩み》。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

——。2006。《20世紀中の家建設と「民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2005。《多民族国家中国》。東京：岩波書店。

——。1998。〈ウンマと中華の間：清朝治下（ちか）の新疆ウイグル社会〉，收錄於《岩波講座：世界歴史イスラーム世界とアフリカ—18世紀末—20世紀初》，樺山紘一編，第21卷，頁97-118。東京：岩波書店。

——。1995。《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研究：中国のイスラムと民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羽田明。1982。《中央アジア史研究》。京都：臨川書店。

佐口透。1971。《19世紀中央アジア社会の変容，岩波講座，世界歴史，近代8》。東京：岩波書店。

新免康。1994。〈「東トルキスタン共和国」（1933-34年）に関する一考察〉，《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46、47合併號

(創立30周年紀念號1)，頁1-42。

- Benson, Linda (楊邊琳). 2002.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review),"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9(1): 277-280.
- . 1990.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Armonk: M. E. Sharpe.
- Fuller, Graham E and S Frederick Starr. 2003. *The Xinjiang Problem*.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Gladney, Dru C. 1993. "The Ili Rebellion (review)," in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598-600.
- Khalid, Adeeb. 1998. *The Politics of Muslim Cultural Reform: Jadidism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malov, Ablet. 2010. "Uyghur Memoir Literature in Central Asia on Eastern Turkestan Republic (1944-49)" in *Studies on Xinjiang Historical Sources in 17-20th Centuries*, edited by James A. Millward, Shinmen Yashushi and Sugawara Jun, pp. 257-278. Tokyo: the Toyo Bunko.
- Klimeš, Ondřej. 2015. *Struggle by the Pen: The Uyghur Discourse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 c.1900-1949*. London: Brill
- Lipman, Jonathan N. 1990. "The Ili Rebellion (review),"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 894-895.
- Millward, James A. 2007.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arr, S. Frederick. (ed.) 2004.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New York: ME Sharpe
- Waley-Cohen, Joanna. 2004. "The New Qing History," i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193-206.
- Wang, David D. (王大剛). 1999.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ning Incident, 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 1944-194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the Yili Rebellion of 1944-49 in Xinjiang*. PhD thesis. Hobart: University of Tasmania.

Whiting, Allen S. and Shih-Tsai Sheng. 1958.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lihan Töre Şagunî. 2006. *Türkistan Kaygısı*. (Kutlukhan-Edikut Şakirov & Oğuz Doğan Trans.) Ergon Verlag: Würzburg (烏茲別克文版本初印於2003) .

三、網路資料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2。《「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0020121/652705.html>。
(2014/09/13瀏覽)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3。《新疆的歷史與發展》。<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3/Document/307907/307907.htm>。
(2014/09/13瀏覽)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9。《新疆的發展與進步》。<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9/Document/418337/418337.htm>。
(2014/09/13瀏覽)

侍建宇。2015/12/3。〈「東突」一號人物：去ISIS不是我們的目的〉，
端傳媒。

<http://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130-international-EastTurk/>。
(2015/12/10瀏覽)

——。2014/2/24。〈北京天安門撞車襲擊事件與新疆本土化伊斯蘭主義
發展〉，台北論壇基金會。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_pdf/125.pdf。(2015/12/10瀏覽)

曹新玲。2013/11/12。〈民國新疆，三十八年風雲際會「民國時期的
新疆」學術研討會紀實〉。<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12/c40531-23517996-2.html>。(2014/09/13瀏覽)

Golden, Daniel and Staley, Oliver. Aug 11, 2011. "China Banning U.S. Professors Elicits Silence From Colleges Employing Them". Bloomberg.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8-11/china-banning-u-s-professors-elicits-silence-from-colleges.html> (2014/09/13瀏覽)